

丛书

创造社

黄侯兴
主编

学苑出版社

文艺理论卷

创 造 社 丛 书

文 艺 理 论 卷

黄侯兴 主编

学 苑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创造社丛书——文艺理论卷

主 编:黄侯兴

责任编辑:田靖

封面设计:张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3号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25 字数:10万字

印 数:0001—900册

版 次: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77-0205-7/Z·25.1

定 价:9.50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纪念

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

郭沫若故居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序

阳翰笙

从一九二一年创造社成立算起，历史仿佛漫不经心地已经走过了七十个年头。

现在，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决定编辑出版六卷本的“创造社丛书”，我是十分赞赏和支持的。因为，无论是从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的价值，还是对当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五四文化传统的意义来说，它都是一项极其有益的工作。欣喜之余，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话，这不能说是“骸骨的迷恋”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飚中，创造社是现代中国文坛第一个树起了浪漫主义旗帜的文学社团。这支突起的异军，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崇尚感情的自然流露，反抗封建的道德规范，鼓吹理想与创造，反对因袭与模仿。他们的作品，在青年读者中赢得了普遍的声誉。创造社前期主办的文学刊物，如《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据说《创造周报》出版后，由初版时每版三千份，后增至六千份，还屡次再版，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还是少见的。总之，“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代表着不同的流派、思潮和风格，双峰并峙，争奇斗艳，各以独异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创造社一些主要成员，从初期有着

较明显的为艺术的倾向，逐渐汇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的大潮中去。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从“昂首天外”转向“水平线下”。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从日本回国参加创造社，给后期创造社增加了新的主力军。在革命低潮期，他们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根据于无产阶级的艺术的憧憬，同时，无产阶级若没有自身的文学，也不能算是完成阶级的革命。在这一回‘革命中的文学’，它必然地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当时创造社有个出版部，它出版的书籍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为了做好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工作，也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周恩来同志指示，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因此，郭沫若在留亡日本前夕，动员了我和李一氓同志参加创造社。当时，在创造社内部，潘汉年、李一氓和我，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小组，属上海市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领导。从此，我弃武就文，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党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我们到创造社后，创办了《流沙》半月刊，后来又办了《日出旬刊》，这两个刊物偏重于社会科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加上原来的《创造月刊》和新出的《文化批判》（月刊），以及稍后的《畸形》（半月刊）、《思想月刊》、《文艺生活》（周刊）、《新思潮》（月刊）等，创造社就有了诸多的刊物，实力确实壮大了，影响也颇为可观。

创造社从成立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八九年间，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局限和思想的偏颇，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近几年来，在提倡百家争鸣的热烈的学术氛围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海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对“五四”前后出现的社团、流派、思潮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满意的收获。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

有助于海内外学人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创造社，并在纵向考察或横向比较中对它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是为序。

1989年12月于北京

编辑说明

一 本丛书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由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编辑出版。主编黄侯兴。

二 本丛书包括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六集。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造社同人的理论主张、思想倾向与发展变化及其作品的风格特色。

三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本丛书侧重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文论与作品。除创造社成员外，兼收一些思想、艺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的文章，力求通过广泛的选录，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创造社活动的全貌。

四 选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创造社活动的历史阶段为序，作者与文章按发表先后排列。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书籍中录用，少数转引自别处或作者对内容有所增删的，文末加以说明。编选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以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

五 本丛书分别由黄侯兴编选文艺理论集、诗集，蔡震编选小说一集、二集，杨均照编选散文集，周亚琴编选戏剧集。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李一氓、夏衍、李初梨、阳翰笙、林林等同志的亲切指导与热情关怀。阳翰笙同志为本丛书作序。林甘泉、马良春、雷仲平、郭平英、李维国、田靖、郑延顺、黄铭华、诸天寅等同志，也曾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编选上仍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六 本丛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

一九九〇年三月

导 论

黄侯兴 蔡 震

—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是我国“五四”新文坛上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作家的全部文学活动，是绚丽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社的正式成立是在1921年夏，这距它的“受胎”已经整整三年了。其间相互通讯征求同人、酝酿出版刊物，几经周折。据郭沫若回忆，1921年7月上旬，他与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人在日本东京开会，商谈酝酿已久的出版刊物、组织文学社团的计划，议定杂志定名为《创造》，出季刊。“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创造十年》）。但近年来学术界不少人根据陆续发现的一些材料考订会议应在6月（有上旬与下旬二说）召开。1921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预告中列出了创造社同人的名单：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社址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320号。以后陆续成为前期创造社同人的还有陶晶孙、王独清、洪为法、张凤举、敬隐渔、滕固、方光焘、倪貽德、周全平、徐祖正、邓均吾、叶灵凤、严良才、楼建南、曹石清等人。创造社并无固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所谓创造社成员，除了最初的几位发起人，就是陆续结

聚在创造社刊物周围，“在那些刊物上，常常发现新的名字”的一批文学青年。

《创造》季刊自1922年3月15日创刊至1924年2月28日停刊，共出版2卷6期。郭沫若的《创造者》一诗为代发刊词，诗中写道：

吹，吹，秋风！
挥，挥，我的笔锋！
我知道神会到了，
我要努力创造！

创造社正式举起了创造的大旗。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学评论与介绍的刊物，至1924年5月19日终刊，共刊行了52号。在刊行周报的同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又接受张季鸾的请求，为《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定名为《创造日》，从1923年7月21日至11月2日，共刊行了100期。《创造日》的宗旨是，“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创造日〉宣言》）。还在《创造》季刊创刊之前，就由上海泰东书局开始出版“创造社丛书”，其中有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以后陆续刊行了“世界名家小说”、“辛夷小丛书”。1923年前后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鼎盛期。

茅盾在回顾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时认为，“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大文学社团的成立，正是新文学运动进入高涨阶段的标志。但是创造社的成立又被视为一支苍头异军突起，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激起了层层波澜。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出版预告中曾说：“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

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渐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这其实表明了创造社成员对于文学革命的一种基本认识。他们认为，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人主要是向旧文学进攻，旧文学既经攻倒，也就无需他们再来抨击，因而他们标榜“创造”，着眼于新文学的建设。同时，他们又不满意于所谓新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粗制滥造、粗翻滥译的现象，主张建设新文学首先要对本阵营采取清算的态度。于是创造社成立伊始，便有同胡适的笔墨官司，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同语丝派的对立等等。

与胡适等人的笔战，是由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一文指摘余家菊译文的错误引发的。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骂人》一文，攻击郁达夫和创造社其他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则相继撰写了《反响之反响》、《学者的态度》二文反诘胡适的责难。胡适随之致函郭沫若、郁达夫，说他的《骂人》一文“只有诤言，而无恶意”，并表示对郭、郁二人在文学上的成绩“只有敬意，而无恶感”。郭沫若、郁达夫亦复信胡适，希望他“大胆尝试，以身作则”来振兴新文学。这场笔墨之战以胡、郭、郁、成等人的互访告结。

《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之后，茅盾以笔名“损”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评论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也不能竟可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更可不必。”由此，惹起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一场论争。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有着对峙的文学主张。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一文中提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郭沫若在《海外归鸿》中暗指文学研究会“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茅盾于是以“创造”给他的印象反唇相讥。此后，郭沫若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之社会使命》等文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

创造社的理论主张。例如艺术“不当是反射的，应当是创造的”，“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的主观产出”；“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成仿吾提出“文学本身的使命”的命题，宣称追求文学的“全”与“美”。郁达夫则主张“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这同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倡并实践着的“为人生的艺术”、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精神、“血与泪的文学”等文学主张大相异趣。双方在论述各自的理论见解时，又常常把立论设在批评对方的基础上。这就是所谓“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争。

被称作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第二个回合”，主要是郭沫若与茅盾关于如何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讨论。茅盾认为，处在中国社会现实的环境下，当务之急是抨击丑恶的现实，改造人，所以他主张着重介绍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而象《浮士德》、《哈姆雷特》一类古典名著的翻译介绍，则“不是现在切要的事”。郭沫若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的好坏，不能说它古不古，只能说它醇不醇，只能说它真不真”。他从“翻译的动机”论述了“翻译的效果”，以为翻译家对于自己所要译的作品能涌起创作的精神，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视作品如己出，那么他译出的作品“当然能生莫大的效果”，这样的译作“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切要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此外，两个社团的作家关于翻译错误的问题，也花费了许多时间进行笔战，然而其中夹进太多的成见与意气。

创造社开张时，一些同仁曾有一种被文坛冷落的感觉，于是他们指责文学研究会“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团体外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落”。他们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也反映在创作评论方面。茅盾等人对于创造社作家的作品评价有贬抑之嫌，而成仿吾等人对于创造社之外的作家的创作也多有讥讽之辞。究其实，创作评论的分歧还是基于两种迥异的文学主张。譬

如对鲁迅的《呐喊》，茅盾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理论，称其“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赞赏“阿Q相”不但“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而且“写出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来了”（《读〈呐喊〉》）。成仿吾则以文艺应该是“表现”而不是“描写”的理论原则，认为《呐喊》的大部分作品只是“再现的记述”，“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他称《端午节》由于作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而《不周山》是“全集中的第一篇杰作”，因为作者“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庭”了（《〈呐喊〉的评论》）。

1924年7月，郭沫若因《文学》周报登载一篇批评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文的文章，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周报“借刀杀人”。茅盾与郑振铎著文作答，挂出了“免战牌”，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宣告结束。

新文学阵营内两大文学社团这场历时三年的论争，固然不无宗派倾向、小团体主义在作祟，因此夹杂着许多意气用事、个人攻击、护己之短、揭人之疤的弊病，但究其实质还在于两种文学思潮的交锋。这一交锋也并非简单地用“为人生”与“为艺术”两个命题所能概括的，它涉及了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创作方法、批评原则等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它是处于开放态势的“五四”新文坛在接受西方近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五四”新文学各种思潮流派时必然要发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所以郭沫若始终不认为有所谓“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艺术的文学”之争。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文学论争，应该说它在客观上对于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创作实践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与理论上表现自我相呼应，创造社作家在创作上基本倾向于主观抒情。郭沫若、穆木天、邓均吾的诗歌，郁达夫、陶晶孙、倪貽德的小说，田汉、郑伯奇、王独清的戏剧，郁达夫、郭沫若、叶灵凤的散文等，他们抒写青年人的郁闷、苦闷，为生计辗转奔波的辛酸，爱情、婚姻不幸的痛楚，穷愁潦倒的倾诉，孤独愤世的叹息，也

有对美好希望的憧憬。这些大都通过坦诚的自我暴露、细腻的心理描写、热烈的直抒胸臆，发而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诅咒与抨击。郭沫若仍然表现出《女神》那样的激情，郁达夫总是带着一点灰色、伤感的调子，倪貽德絮絮不休地诉说着心中的积郁，性爱是张资平创作的焦点，而且用的是写实式的手法。

1924年8月《洪水》周刊创刊（仅出1期），复刊后改为半月刊。此前的“五卅”运动使创造社一些主要成员思想发生了变化，从追求文学的“全”与“美”，转而关注社会问题。这就是郭沫若说的“洪水”时期，“有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等一批新力军出头，素来被他们疏忽了的社会问题的分野，突然浮现上视界里来了”（《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在4月初开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随后致函成仿吾，宣布自己“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孤鸿》）。他还与周全平一起赴江苏宜兴调查卢齐战祸，写了《到宜兴去》一文。周全平在《洪水》创刊号上发表的《撒但的工程》一文提出“破坏是比创造更为紧要。不先破坏，创造的工程是无效的”。刊物定名为“洪水”，即是表示“渴慕着那能毁坏一切的洪水”。《洪水》与前期创造社刊物的一个明显差异，是它用了相当篇幅刊登有关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的评论、杂感、论文等。如郭沫若与国家主义派的思想论战，成仿吾批评复古派的文章，洪为法、周全平的社会杂感，李民治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

代表前期创造社文学倾向的郭沫若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郁达夫试图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成仿吾在谈到《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时认为，“真的艺术，必有它的社会的价值”。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提出“第四阶级”的文艺（即无产阶级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革命与文学》中他更明确提倡“革命文学”，指出“我们所要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926年3月，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同赴广州，与先期到达的成仿吾一起应聘于广东大学，郭沫若并于同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

创造社在这一时期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又先后创办了《创造月刊》、《A·11》周刊、《幻洲》周刊等刊物。其中《创造月刊》从1926年3月至1929年1月，共出版2卷18期，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刊物。1926年9月，创造社出版部举行第一次理事会，会上选出创造社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总务委员郭沫若，编辑委员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成仿吾，监察委员张资平、王独清，并通过了《创造社社章》。

广州是当时革命的策源地，置身于那种轰轰烈烈的氛围中，创造社成员之间的思想分歧日益明显。郁达夫以《广州事情》为题发表政论，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现象，表示了他的失望和不满。郭沫若、成仿吾分别写信、著文指责《广州事情》一文，加以出版部的一些纠纷，郁达夫在1927年8月宣布与创造社脱离关系。这时郭沫若已被蒋介石通缉，参加南昌起义后秘密居住在上海，前期创造社的核心于无形中解体。

1927年10月郑伯奇等人计划发起新的文学运动，并征得郭沫若同意，邀请鲁迅合作，共同出版文艺刊物。郭沫若介绍了李一氓、阳翰笙参加创造社，又有成仿吾赴日本邀请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一批青年加入创造社工作，是为后期创造社。

与鲁迅联合办刊物一事没有实现，创造社创办了《文化批判》月刊，从1928年1月至5月，共刊行5期，这是创造社后期重要的理论刊物。此后又相继创办了《流沙》半月刊、《畸形》半月刊、《思想》月刊、《日出》旬刊等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号的《祝词》中提出，它的任务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

起”。郭沫若称这一时期的创造社，“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又来了一个“剧变”（《文学革命之回顾》）。

所谓创造社后期的“剧变”，是指它的作家对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文艺采取了全面批判的态度，并且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它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

早在1925年前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动向，创造社一些主要作家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文学活动要跟随社会现实发展的步伐。这时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处于高涨时期，也给予他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于是从1928年起，他们正式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郭沫若、冯乃超、成仿吾、李初梨、华汉等相继发表文章，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蒋光慈、沈绮予等先后在创造社刊物上撰文详细介绍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创造社还同太阳社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协同作战，开展革命文学运动。

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首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既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指导者”，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便“不要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而是“历史的内在的发展”的必然。他们又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无产阶级文学作为“阶级的武器”，应该“为完成它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而斗争。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世界观的基础上，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前提，在于作家确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他们要求革命作家“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要多接近工农群众的生活，“才能写出革命的东西”。这些理论主张，初步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性质和任务，也明确了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问题。但是他们的主张也明显地表现出思想认识和方法论上的片面性，存在着某些机械唯物论的倾向。

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创造社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概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否定了“五四”新文学。他们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称鲁迅为“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代言人”、“封建余孽”，认为鲁迅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二重的反革命”。由此而引起新文学阵营内部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社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茅盾的作品和文学主张。尽管茅盾在当时的创作和理论上表现出比较浓重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但创造社称其作品“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反对的”，则显然是有偏颇的。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时，郭沫若、李初梨等人夸大了文艺的作用，认为文艺应该领导着时代走；在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时，忽视文艺自身的特征和规律性，甚至声称把文艺技巧留给“昨日的文艺家去努力”；在主张作家应该转变世界观时，把这种转变看成仅仅是从书本上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而且仿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由于这些理论主张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使创造社所倡导的这场革命文学运动带有“左”倾幼稚病的色彩。

与理论主张相呼应，创造社一些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反映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和斗争，二是写实的色彩有所增强。如郭沫若的小说《一只手》，龚冰庐的小说《炭矿夫》、《矿山祭》，华汉的小说《趸船上的一夜》、《马林英》，黄药眠的诗《五月歌》，冯乃超的诗《外白渡桥》，郑伯奇的戏剧《轨道》等。此外，潘汉年、李一氓、冯乃超、段可情、黄药眠等人的散文、随笔、政论、杂文，或指斥时弊或抨击现存秩序或传播社会科学知识，都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1929年1月，国民党通令查禁《创造月刊》、《思想》及其它几种进步刊物，并密令封闭创造社。2月7日，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南